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若干重要思想范畴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Important Ideological Categories in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目的/意义]**古代中国是一个图书馆实践与理论早熟的国度。古代中国人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自主探索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图书馆实践方法和理论认识,就是梁启超所言“中国的图书馆学”。本文正是为了归纳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而作。**[研究设计/方法]**古代中国人完全自主地提出诸多图书馆学思想范畴,本文选取其中的五个范畴加以阐释,分别是:“书即道,道即书”;“藏秘书,处贤才”;“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爱书须传布”。**[结论/发现]**发现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极富专业性和哲理性,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创新/价值]**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传承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图书馆学思想 思想范畴 古代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20)03-0083-0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cient China was a country of early-matured library practice and theor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ndependently explored an approach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understand the library theori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in an almost completely enclosed environment. Thes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re what Liang Qichao called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is study is just an inductive study on these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thoughts. **[Design/Methodolog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autonomously proposed many ideological categ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research selected five of them for elaboration. Firstly, writing books are meant to convey truth, and the truth is recorded in books; secondly, collecting books is to educate people; thirdly, reviewing literature is to show the truth; fourthl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leaving the question open; fifthly, if you love your books, you should spread them. **[Findings/Conclus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ough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re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philosophical, which are not inferior to the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at all. **[Originality/Value]** Though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st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f inherit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library theories.

[Keywords] Ide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Category of ideology; Ancient times; China

0 引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本土性特征

众所周知,科学本身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国籍和民族归属;一种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历程表现。包括科学事业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事业都在不同的国度展开其发展历程,因而留下不同国家的烙印,形成各自国家的特色。这

就是事物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原理的正确性所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必然有其不同于现代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特征,当然也有不同于国外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特征。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特征,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本土性特征。

[作者简介] 蒋永福(ORCID:0000-0002-2499-9539), 学士, 教授, 研究方向: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Email:jiangyongfu916@163.com。

与西方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比,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本土性特征表现在多方面,诸如:中国古代的官府图书馆、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都较发达,但始终未能生发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制度;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自隋代以来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使用制度上实行的是科举制度,没有形成西方国家那样的大学教育制度,所以中国古代只有书院图书馆而没有生发出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图书馆制度和学校图书馆制度;在藏书及其利用观念上,中国古代图书馆秉持的是“以藏为传”“以藏为用”的理念,而没有形成西方图书馆那样的“为流通而藏”的观念,亦即没有形成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以及主动宣传和服务的馆藏利用局面(在观念上曾出现过开放观念如著名的“建儒藏以共读之”的观念等,但未能付诸全面的实施);在皇家馆阁人员的任用上,逐步形成了由权臣领衔(如唐宋时期的史馆由宰相兼领等)、学者型文官为主体的任用模式,而没有形成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大学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人才培养与选聘制度;在文献分类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形成的是经史子集四分为主流的非学科分类传统,而没有形成西方图书馆那样的学科分类传统;在目录类型上,中国古代的目录几乎是清一色的分类目录,而没有大量出现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等其他目录形式,即使是分类目录,亦非西方图书分类那样的严格遵循形式逻辑、概念逻辑的学科知识分类目录,而是非形式化、非概念化分类目录;在编目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形成的是以“申明大道”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理想目标的学术史梳理传统,而没有形成西方人所编书目那样的以方便检索为目标的形式化编目传统等等。

可见,无论是图书馆管理方式,还是图书馆文献整理和利用的方式方法,中国古代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迥然异趣。总之,“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1],由此必然形成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的本土性特征,这是历史事实,无需置疑。这也是梁启超当年倡议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历史依据所在。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藏书之所其名各异。至宋代,人们把国家藏书之所一般统称为“馆阁”,

程俱所著《麟台故事》就多次使用“馆阁”一词,而陈骙所著《中兴馆阁录》则直接用“馆阁”一词冠其书名。至南宋,一些人开始用“藏书楼”一词统称各类藏书之所,当然亦有直接以“藏书楼”命名藏书之所者^[2]。本文所用“中国古代图书馆”一语即指这种以“馆阁”或“藏书楼”形态存在的藏书与治书之所。

1925年,梁启超倡议“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首先要弄清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任何思想体系,都由相关概念、理念、命题等范畴有序组合而成。古代中国人提出有诸多图书馆学思想范畴,本文选取其中的五个范畴分别予以阐释。

1 “书即道,道即书”

南宋学者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指出,“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3]。包恢在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学命题,即“书即道,道即书”。包恢的这一命题,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其意:

其一,圣贤作书是为了明道,即把道记述在书中,以期他人或后人藉此明道,所以说圣贤之道在书中。正因为圣贤之道在书中,而不在他物中,所以读圣贤之书也就等于读圣贤之道、明圣贤之道;如果没有圣贤所作之书,圣贤之道便无以存、无以传、无以明。由此而言,圣贤之书和圣贤之道之间是一种“等价”关系,故曰“书即道,道即书”。

其二,圣贤之道的传承,如果撇开口口相传的共时性传播渠道,那么只能借助特定载体进行历时性传播,这种特定载体主要是书(广义上而言就是文献)。在古代汉语语境中,“书传道”和“辞传道”可视为同义语,故柳宗元言“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4]。若仅从历时性传播渠道而言,人们只能通过圣贤之书才能了解和把握圣贤之道,别无他径。由此而言,圣贤之书和圣贤之道是合二为一的“一体物”,不可分割,故曰“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

我们可以认为,包恢所言“书即道,道即书”,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思想逻辑的具体化发挥。宋人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

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5]周敦颐是在批评“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的语境中提出“文以载道”命题的。按照周敦颐的界定，只有载道之文才能称其为“文”，而文辞之文只能称为“艺”。周敦颐的这种重文轻艺的观念，显然是道学家一贯秉持的重视“阳春白雪”之文而轻视“下里巴人”之文的封建等级观念的产物。不过，后来的一些人没有一概按照“文”与“艺”二分逻辑把“文”的范围限定在“载道之文”，而是把“文”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文本”(text)——只要是承载意义的作品都可称为“文本”。显然，文本的意义并不限于道德意义上的“道”，因为每一事物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任何意义都可视为该事物的“道”，如道德之道之外还有自然之道、审美之道等，这就是万物各有其道的原理所在，诚如程颢所言“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6]。甚至“文”本身亦有其特定的意义显示之道，而不只是他物之道的显示工具或附庸，诚如章学诚所言“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7]。章学诚这里所言“文自有理”，就肯定了“文”自身有“文之理”的独立性。当然，对“文”之独立性的发现，只是对“文”与“道”关系的一种理解，而非唯一理解，更非主流性理解。在中国古代，“文以载道”始终是对“文”与“道”关系的主流性理解。包恢的“书即道，道即书”命题，就是以这种主流性理解为前提而对“书”与“道”关系所作的概括。这是“书即道，道即书”命题的思想来源之一。

“书即道，道即书”命题的另一思想来源是中国古人的道器合一思想。在道器合一论视域中，书是载道之器，这里的“载道”一词不仅有静态意义上的承载之意，同时蕴含着动态意义上的传道、明道之意。也就是说，道可以通过书而传播和阐明。反过来说，无书则道无以传播、无以阐明，尤其在历时性传播路径下更是如此。对此，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如朱熹说“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

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8]。朱棣在《性理大全·御制序》中也指出：圣人未出生时，道在天地之中；圣人出生后，道在圣人头脑之中；圣人已故后，则道在六经(书)之中。正因道在书中，所以学者明道须读书，诚如南宋欧阳守道所言“学也者，因圣贤之书，求圣贤之心”^[9]。若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语言说，道记载于书中，离开书，道无以向人显现；道就是书中文字所显现出来的意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其实这句话应该说成“存在与本质同体无间”，即存在与本质同生共存，无所谓孰先孰后。正因如此，二程才说“器亦道，道亦器”^[10]，也就是说，道与器之间也是同体无间的关系——道不能离器而存在，道与器只能合一而存。对圣人已故后的人们而言，圣人之道存在于书中，书是载道之器，道与书同体无间，所以说“书即道，道即书”。

图书馆因藏书而成其为图书馆，无书便不成其为图书馆。因此，欲想知道图书馆是什么，首先要知道书是什么。包恢以“书即道，道即书”一语，从本体论高度回答了书是什么的问题。不仅如此，包恢的这一本体论定位，揭示了“道在书中，而书又在图书馆中，因此可以说道亦在图书馆中”的道理，因而为理解图书馆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本体论视角——图书馆是藏道、传道之器。

2 “藏秘书，处贤才”

众所周知，汉初萧何令建的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等均为藏书之所，可以视之为古代早期以馆阁或藏书楼形态存在的官府图书馆。中国古代官府图书馆的功能是什么？对此，《汉宫殿疏》指出，萧何令建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等藏书之所的用意在于“藏秘书，处贤才”^[11]。从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官府图书馆所发挥的实际功能看，官府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就是“藏秘书，处贤才”。

在东汉，兰台和东观是国家的主要藏书之所，《通典》卷二十六云兰台、东观“多当时文学之士”，如马融、刘珍、班固、傅毅等名儒就“雠校于其中”。唐代李世民任秦王时令建文学馆，鸠集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十八位贤达人士为学士，被称为“十八学士”，这些人后来大多兼职于弘文馆，成

为馆职人员。唐开元时期,唐玄宗命张说、徐坚、毋煚等名流学者亦为“十八学士”,其中大部分人兼职于集贤院等馆阁之中。北宋“三馆秘阁”(合称为崇文院)聚集了当时大部分天下贤士,如欧阳修、曾巩、苏轼等饱学之士都曾入职或兼职于崇文院或者其他馆阁。南宋的馆职人员,见于《南宋馆阁录》及其《续录》者有九百六十六人,其中绝大部分为进士及第或同进士出身。至于清代的“四库馆臣”,更是群星璀璨,包括纪昀、翁方纲、陆锡熊、姚鼐、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王念孙、孙希旦、周永年等三百六十名天下名流皆充其中。以上是古代官府图书馆“处贤才”的史实证明。

中国古代官府图书馆为什么要“处贤才”?这与古代中国人对图书馆职能的独特认识直接相关。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官府图书馆是一种既具有文教职能又具有资政功用的综合性机构。《新唐书·百官志》所记载的弘文馆的职责是“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义轻重皆参议”。宋人范仲淹亦曰:“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以待顾问。”^[12]可见,弘文馆、崇文院等馆阁是一个集文献整理、储养人才和咨询顾问为一体的综合性职能机构。能够胜任这种综合性职能机构的工作任务者,非饱读诗书之文人贤士莫属。馆阁之重要性首先体现于馆藏之书的重要性上,书为载道之器,道在书中,所以宋太宗手指馆藏之书曰“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13]。书不仅是载道之器,而且还是教人之器、育人之器,馆阁亦随之成为教人、育人之器,所以宋英宗说“馆阁所以育隽材”^[14]。这是人们关于官府图书馆“处贤才”功能的思想认识定位。事实上,古代的皇家馆阁系统确实起到了“育隽材”的作用,如南宋二百三十余名宰执人员中,馆职出身者占大半^[15]。

如果说“藏秘书,处贤才”是官府图书馆的基本功能表现,那么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功能是否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呢?这里所谓“其他类型图书馆”指私家图书馆、书院图书馆和寺观图书馆,它们与官府图书馆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类型图书馆。如果把“藏秘书,处贤才”中的“处贤才”理解为“育人材”,那么中国古代所有类型图书馆的基本功能都

可用“藏秘书,处贤才”来概括,只不过各类型图书馆的“处贤才”的功能表现有所差异,其主要表现是: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以待顾问”的功能一般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其他类型图书馆都有培育人才的功能,这一功能可以视为官府图书馆“处贤才”的前期预备性功能,因为官府图书馆的馆职人员在任职之前大多利用其它图书馆勤奋治学而走上升之路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四大类型图书馆的共同功能是“藏秘书,处贤才”。如果我们适当弱化“藏秘书,处贤才”命题中的“为朝廷培养御用人才”的意味,而适当增加“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意味,那么可以把中国古代四大类型图书馆的功能概括为“藏书以育人材”。“藏书以育人材”,是中国古代在“学而优则仕”人才政策指引下形成的功能特点。“图书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古代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这一功能定位,使得人们把入职于图书馆视为“学而优则仕”的主要渠道之一,因而图书馆职业备受人们青睐。反观现代人们的职业选择观,图书馆职业的崇高性已“风光不在”。时代不同使然,还是我们对图书馆的功能定位有偏差,对此我们应该深思。

3 “部次流别,申明大道”

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根据这一段话,后世人们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为目录学的宗旨,而不是章学诚自己所言的“校雠之义”^[16]。那么,“辨考”是否为目录学的宗旨?这是一个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学术类型和流派需要辨别,学术思想发展或流变的原委需要考证,这种辨别与考证的工作,在现代社会主要属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任务。在中国古代,“辨考”的工作主要由被称为“校雠之学”的学问来完成。狭义的校雠,指校订文字之误之业;而广义的校雠,清人孙德谦在《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中共列出刘向校雠工作的二十三义,包括: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篇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

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可见，刘向开创的校雠学的内容既包括文献整理之事，又包括学术辨考之事，而且以学术辨考为重点内容。我们知道，章学诚是“宗刘”的，说明章学诚是以刘向开创的广义校雠学为视角来界定“辨考”为校雠学的宗旨的。“辨考”之所以既被认为是校雠学的宗旨，又被认为是目录学的宗旨，是因为章学诚与后世人们对校雠学范围的侧重视角不同所致。

章学诚把“辨考”指认为校雠学的宗旨，而否认是目录学的宗旨（准确地说章学诚根本不承认目录学的存在），即使章学诚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也不能认为把“辨考”界定为目录学的宗旨就毫无问题。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之《互著》篇中指出：“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笔者认为，按照章学诚的思想理路，其所言“部次流别，申明大道”才是校雠学的宗旨。我们知道，章学诚的主要理论著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而《校雠通义》以《原道》篇开篇，《文史通义》第二篇中亦有《原道》一章，说明章学诚所论所言都是以“申明大道”为宗旨的。这说明，在章学诚的思想观念中，一切学术都要以“申明大道”为旨归，包括校雠学。这就表明，在章学诚的观念视野中，“辨考”是手段范畴，而不是目的范畴。据此笔者认为，与其说“辨考”是目录学的宗旨，不如说“申明大道”是目录学的宗旨，因为“申明大道”比“辨考”更具本体意义。

众所周知，“道”是事物发生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规律，是中国古人在言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所言“绝对精神”的本体概念。章学诚提出的“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命题，把校雠工作的意义提升到本体论高度，使得中国古代的校雠学或图书馆学具有了“本体之学”的地位，这是章学诚的一大历史功绩和学术贡献。

在中国古代，校雠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工作之一；校雠学最接近于图书馆学。章学诚把校雠学的宗旨概括为“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其对当代图书

馆学的启发意义在于：图书馆学是以“申明大道”为宗旨的本体之“学”，而不只是“甲乙部次”、收发读物、提供检索指导的技能之“术”；图书馆学不只是可以“以技观之”的技能之术，它还是可以“以道观之”的理论之学；若缺乏“以道观之”的视角，图书馆学的学术性将无以显现；对“图书馆之道”的归纳和阐释，就是理论图书馆学的学术使命所在。

4 “实事求是，多闻阙疑”

众所周知，在现代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除了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之外，校勘工作不占核心地位，也不具有日常工作性质。然而，在中国古代，校勘工作则是馆阁及其工作人员的极其重要且常规的工作内容，因为古代的书籍由于材质、印刷以及装订技术的简陋和传抄过程中难免的错讹，不经校勘简直无法阅读。清人王鸣盛指出“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7]。清人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则干脆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18]。

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校勘工作中，逐渐形成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这句话出自南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自序所引周必大之语：“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周必大）先生之言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南宋学者周必大致仕后曾主持校定《文苑英华》，他在《文苑英华序》中说：“晚幸退休，遍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阙疑尚多，谨俟来哲。”这里所言“遍求别本，与士友详议”，就是“多闻”的表现；而“疑则阙之”、“阙疑尚多，谨俟来哲”则表现了“阙疑”的谨慎精神。其实，“多闻阙疑”一语的最早提出者是孔子，《论语·为政》篇中就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一语。孔子这里所言“多闻阙疑”虽不是针对校勘文献之事而言，但这一精神无疑为校勘工作指明了原则方向。再者，孔子所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亦可视为校勘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诚如东汉人何休所言“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臆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9]。也就是说，孔子此“四毋”以警戒语方式指明了如何做到“多闻阙疑”的具体方法。

我们知道，校勘文献所追求的目标是“复原还

真”，而反对的是妄增臆改。唐人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批评校书者“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做法，说自己注《汉书》追求的是“归其真正”、“克复其旧”。此“克复其旧”就是“复原还真”，而批评“意有所疑，辄就增损”，就是批评这些人未能做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校书者遵循“复原还真”的原则，而避免妄增臆改，才能为后人留下尽量完整如初的文献，诚如清代著名校勘家卢文弨所言“第始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获得见完书”^[20]。妄增臆改是古书“多失其真”和古书本义亡失的罪魁祸首。清代著名校书家顾广圻批评南宋建阳书坊刻书“任意增改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玄卖，而古书多失其真”^[21]。顾炎武痛批妄增臆改之风说“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任意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22]。可见，避免妄增臆改，就是为了“复原还真”，这是一种替古人保存“真书”、为后人传递“完书”的薪火相传之业，而为了保存和传递“真书”、“完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

为了做到不轻改书，古代中国人往往采取底本和校本“两存之”的办法，即使发现明显的错误，亦采取“择善而从”或“仍之”的态度，在校勘记中予以说明，而不轻改底本原文。北宋嘉祐年间，林亿等人以《伤寒论》为底本校订《金匱玉函经》，当时发现“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但为了不改动原书，采取了“两存”之法，对此，林亿的解释是“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23]。针对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欧阳修指出“难以臆断为定，当两载之，使来者自择”^[24]。对此，章学诚亦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人校讎，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宜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25]鲍廷博则肯定了“择善而从”和“仍之”的做法，其曰“遇有互疑之处，择其善者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26]。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人所秉持的“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为古代图书馆保存和传递“复原

还真”的文化典籍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这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

5 “爱书须传布”

清乾嘉时期的张金吾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楼名曰“爱日精庐”，藏书曾达到十万六千卷。他曾购得包希鲁撰《说文解字补义》十二卷元刊本，视若珍宝，他为此书作解题时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用倩善书者录副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27]张金吾对自己所爱之书“不敢自秘”而要“广为传布”，他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宝爱是书”的表现，这就是张金吾的“爱书须传布”的思想。

其实，“爱书须传布”思想并非张金吾首倡，更非张金吾独有，而是早已有之。从私家图书馆的情况看，晋代范平的藏书楼“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北齐颜之推有“借人典籍，皆须爱护”一语，说明当时“借人典籍”之事已较普遍；北宋宋敏求家富藏书，当时许多士人为了借其书方便而“多居其侧”；元代藏书家冯梦周，有人借其书“损坏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与之”；明代藏书家李如一，别人“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等等，说明私家藏书楼之藏书是流通传布的，而非一概“秘不示人”。寺观图书馆向信众和来访者开放，书院图书馆向学员和周围人开放，亦为人所皆知之事。至于清乾隆皇帝置《四库全书》江南三阁允许士人借抄，更是有明确记载。这些事实都表明，古代图书馆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大多具有“爱书须传布”的思想和行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许多开明人士提出有书籍流通传布思想，如金人孔天监的“便于众”的藏书开放思想，明人姚士粦的“以传为藏”的藏以致用思想，清代曹溶的“有无相易”的图书交换流通观（以其《流通古书约》为证），宋咸熙的“愿借与人，与人共之”的共享精神，曹学佺的“修儒藏以全藏用”设想，陆世仪的“胜地藏书以传万世”设想，周永年的“建儒藏以共读之”思想（儒藏说）等等。可

见,在中国古代,“爱书须传布”思想并非个别人的思想,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

无须讳言,中国古代确实亦有一些视书如命而秘不示人的藏书家。在小农经济时代,倾尽家财而形成的家藏,已经成为家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珍惜家产,不使其流失,因而产生秘不示人或不愿借与人的心理,这是一种人之常情,无需苛责。有一些书籍,材质精良,写印精美,因而价格昂贵,不易购得,一旦购得便被视若珍宝,进而不愿借与人。清代藏书家对“宋槧元刻”之书的格外喜爱,自然产生不愿借与人的保守心理。钱谦益、黄丕烈、陆心源等藏书家收藏有较多的“宋槧元刻”之书,这些书自然他人难以借得。还有一些书籍是藏书家的“特藏”,一般人难以借阅,如明代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中收藏有较多的地方志和科举史料,这些书在其他藏书之所很难见到,大部分属于“孤本”,为此范钦向家人作出了“书不出阁”的严格规定。总之,书本身的珍贵以及购得之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籍的流通。但我们要知道,许多珍本典籍就是在藏书家的珍藏保护下得以留传的,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珍藏本身就是一种“传”、一种“用”。众所周知,现代人常用的古籍,大多来源于清乾隆时期所修《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绝大部分来源于民间藏书家所献。不独《四库全书》,此前各朝代的国家藏书,绝大部分亦来自民间征集。可见,民间藏书家为中华典籍的代代留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往不少人把古代藏书楼的特征概括为“重藏轻用”,其实这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识,因为这些人是以现代图书馆向所有的人开放为“参照物”的,殊不知古代藏书楼的作用方式是“以藏为传”、“以藏为用”,亦即古代藏书楼是“重藏重传重用”。把古代藏书楼的特征概括为“重藏轻用”,显然犯了“以今论古”的思想逻辑错误。

在一般意义上,书籍的价值可分为物质载体价值和思想内容价值两方面。具有高物质载体价值的书籍(如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籍),往往使人产生珍藏和不愿借与人的心理,而书籍的思想内容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则又要求广泛传布,与他人共享。由此而言,“爱书须传布”的命题,包含着“珍藏”

和“传布”两方面意涵,但更侧重于“传布”的一面。把书传布给他人,与他人共享,这种精神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他者伦理”。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伦理观就是典型的“他者伦理”。我爱书,他人亦爱书;我爱书而不愿借与人,他人亦因爱书而不愿借与人,如此循环,则书之价值仅限于我,而无法惠及他人,这显然有悖于“他者伦理”。我需要借书,他人亦需要借书;我心中想着他人借书的需要,他人也会想着我的借书需要,如此互相满足对方的借书需要,这种互借共享之举显然是发扬“他者伦理”的表现。由此可以说,“爱书须传布”的理念具有坚实的伦理基础和实践基础。从历史的眼光看,在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能够自觉提出“爱书须传布”的思想,不啻为近现代图书馆开放观念及其实践的历史先声,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人对书籍和图书馆价值的“先知先觉”,这何尝不是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所在?!

6 结语

以上,笔者选取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五个重要思想范畴作了初步解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图书馆人提出有诸多重要思想范畴,绝不限于上述五个方面,诸如:“世无书籍,人之事混矣”,“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的文献价值观;“览录而知旨”的目录观;“求书八法”、“鉴书五审”、“据目求书”等文献收集法;“鉴版识书”的版本观和善本观;“藏书以传道”的馆阁观;“馆职为美职”的馆职观等等。这些认识之论和方法之论,构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主体。任何一门学科理论的发展都有一个古今承继和与国外交流互鉴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引入、吸收国外的图书馆学思想和做法而忘却继承本民族的优秀图书馆学思想传统和实践传统。本文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五个重要思想范畴进行阐释,就是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传统而作的一种努力。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所论五个方面的思想范畴,只是其“冰山一角”而已。笔者愿意把此文视为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片论”,同时亦视为“引玉”之砖,以此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添砖加瓦。

(下转第 108 页)

-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92-393.
- 62 Meuschke N, Stange V, Schubotz M, et al. Improving Academic Plagiarism Detection for STEM Documents by Analyzing Mathematical Content and Citation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120-129.
- 63 Ghosal T, Verma R, Ekbal A, et al. A Sentiment Augmented Deep Architecture to Predict Peer Review Outcome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414-415.
- 64 Mohapatra D, Maiti A, Bhatia S, et al. Go Wide, Go Deep: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Papers through Influence Dispersion Tree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05-314.
- 65 Keselman L. Venue Analytics: A Simple Alternative to Citation-Based Metric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15-324.
- 66 Pride D, Knoth P, Harag J. ACT: An Annotation Platform for Citation Typing at Scale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29-330.
- 67 Freeman C, Roy M K, Fattoruso M, et al. Shared Feelings: Understanding Facebook Reactions to Scholarly Article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01-304.
- 68 Shaikh A R, Alhoori H. Predicting Patent Citations to Measure Economic Impact of Scholarly Research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98-399.
- 69 Cong T, Chen B, Ming W. Global Science Discussed in Local Social Media: WeChat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Web of Science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370-371.
- 70 Choi Y, Joo S. Topic Detection of Online Book Reviews: Preliminary Results [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New York: IEEE, 2019: 418-419.
- 71 Xu W, Esteva M, Trelogan J.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tegrating Data Management,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C]//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New York: ACM, 2018: 423-424.

(收稿日期: 2019-09-18)

(上接第89页)

参考文献

- 1 吴晞. 论中国图书馆的产生[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2(2): 22-24.
- 2 江向东. “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1(6): 108-112.
- 3,9 陈谷嘉,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81-182.
- 4 柳宗元. 柳河东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50.
- 5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4.
- 6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3.
- 7,25 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21, 98.
- 8 朱熹. 朱熹集[M]. 郭齐, 尹波点校.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4066.
- 10 朱熹, 吕祖谦. 朱子近思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4.
- 11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339-340.
- 12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434-3435.
- 13 程俱. 麟台故事校证[M]. 张富祥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8.
- 14 脱脱等. 宋史(简体字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2596.
- 15 张富祥. 南宋馆阁制度述略[J]. 山东师大学报, 1986(4): 10-16.
- 16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6.
- 17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黄曙辉点校.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序言.
- 18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李庆西标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08.
- 19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春秋公羊传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93.
- 20 卢文弨. 抱经堂文集[M]. 王文锦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42.
- 21 顾广圻. 顾千里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64.
- 22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69.
- 23 林亿. 校正金匱玉函经序[A]. 全宋文(第22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24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018.
- 26 鲍廷博. 知不足斋丛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凡例.
- 27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M]. 冯惠民整理. 中华书局, 2012: 98.

(收稿日期: 2019-07-24)